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从被囚到平反	蔡鸣乔
【劫后反思】	我所目睹的最早的文革暴力	扬子浪
【史实辨析】	关于江青的两件事	李海文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
——从被囚到平反

· 蔡鸣乔 ·

一、北师大4·26事件

1.我们被抓到了怀柔

1971年4月25日，星期天，半夜时分，师大校园内安谧肃静，人们都已经入睡。忽然，在校园南端的中南楼爆发出猛烈的打砸声，顿时人声鼎沸。我当时住在一楼东头的一间宿舍，被惊醒后开门出来只见楼道灯不亮，在黑暗中许多手电光到处乱晃。校宣传队的人带着数百名军警正从各个房间里往外拖人。楼道里一片混乱。到处是叫骂声、打砸声、手提电扬声器的指挥声。我刚问了一句：“怎么回事？”一名手中拿着一张纸的宣传队员用手电对我一照，大喝一声：“抓走！”顿时上来三名军警，一人揪住头发按头，两人一边一个拧着胳膊往楼道外拖。我本能地挣扎叫喊：“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回答我的是一顿拳打脚踢，当即右眼被打得青紫，腰被踢伤。

在拖到楼外的路上，我被压低着头，只见地下散落着一些衣物，不知谁的一条蓝色衬裤从眼前掠过。从楼里抓出的人被押到中南楼东侧的11楼前，一律低头弯腰喷气式。然后在统一指挥下，不走校门，被押着从11楼西侧、中南楼南侧的校园围墙豁口处拖到校外的学院南路上。学院南路上已经停了十几辆各种汽车，我被押上了一辆大客车，坐在最后一排，身边一边一个军警。与我同一辆车的有十几个同学，和我一样，都是两三个军警押一个。

车在路上走了大约三四个小时，等到地方时天已经亮了。车队开进一处兵营，下车以后集中在院子里等待。这时有一同抓来的北京籍学校工友，认出了周围的山势环境，说：“可能是怀柔。”

据说当时抓来的大约有110人左右，后来发现有一些人不在名单上，于是放了一些人回学校。放走一些以后，还有70几人。被抓的大部分是住在中南楼的各系男生，也有一些是从中北楼抓来的女生，还有从家中抓来的学校工友。大部分衣衫不整，有的是从被窝里拖出来的。后来听说还有一些人是4月26日以后抓来的，也有一些陆续放回去的，抓抓放放，在怀柔最后关着的人数大体维持70人左右。

这些人被押到七八个临时监房内，每个房间七八人、十几人不等。没有床，在地上放了一些木板。被抓的人情绪都很激动，纷纷质问为什么抓人，无人理睬，大家决定绝食抗议。这时有几位军人来动员大家进食，同时送来开水，但无人听从劝告吃饭。绝食持续了两三天。这时开始将我们一个个带离，一部分单独隔离，一部分两三个人关在一间屋里。

2.对我宣布隔离审查

我被单独关在一间临时监房内，窗户关着，从外面糊上了报纸，天花板上有一盏小瓦数灯泡，被吊得很高，有一张木板床。门外有两个士兵站岗，要上厕所须敲门，来回由一名士兵押着。从抓到怀柔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没有看到师大宣传队的人出现。开始几天无人理睬，没有放风时间，也没有任何书和报纸可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看着从窗上报纸缝隙里射到墙上的阳光，看着那一丝阳光一点点地移动。

后来来了三个军队干部，两男一女，一位姓焦的副连长，一位年轻的姓张的男同志和另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也姓张。还有一位戴眼镜的50多岁的老头，也姓张，好像是个领导，有时候也来。开始带着我学习，动员平山头、批派性，态度还算和蔼，我也甚是配合。我问他们为什么抓人，他们说：“前两天（4月23日）‘五·一’大清查，你们阻挠破坏大清查。”（那个年代里每到节假日之前，北京市都要到每家每户清查户口，以防阶级敌人破坏，听说4月23日晚清查时有个别宿舍的学生和工宣队的人发生了争吵）。我说：“4月23日晚，工宣队敲我们宿舍的门，我很快就开门了，工宣队师傅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怎么破坏清查了？”那位年龄大的老军人说：“现在态度顽固的就是你们这些似乎与4·23的事关系不大的人。”

大约到六月下旬，调子慢慢变了，说我有问题，要老实交代。直到7月26日，师大军宣队一个叫雷炳的出现了，才宣布对我“隔离审查”。我说：“不是早就隔离了吗？”雷炳极为凶狠地说：“你的问题很严重，是现行反革命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这时开始，他们给我换了一间囚室，除了门口有两个战士看守外，窗外还有一个流动哨，日夜监视，晚上不许熄灯。

此后，雷炳平均每星期能来一次，雷炳说：“你们口口声声把自己打扮成反对5·16的英雄，你们自己就是5·16！”我说：“5·16是矛头指向周总理（1）（2）的阴谋集团，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卫周总理。我不是5·16，你不要搅浑水！”雷炳说：“江青（3）同志说了，5·16不仅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也指向‘中央文革’。只要有行动，没参加5·16组织也是5·16！”并且厉声地说：“你老实一点！不老实，把你拉回学校见群众，给你加加温！”他们要我交代所谓怀疑康生（4）的问题，后来又上纲要揪反革命小集团，要我供认有纲领、有计划、有黑线，说：“刘××都交代了。”我说：“他交代了是他的，我不知道！”七、八两个月一直逼得很凶，白天晚上不让好好睡觉。我对他们说：“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不是什么秘密。在1968年宣传队进校时我就把有关情况向工宣队师傅说了，许多同学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要我写交代材料。室内没有桌椅，只给一个马扎，写材料坐在马扎上趴在床沿写。我怀疑康生的问题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写着写着就没得可写了，雷炳就说：“态度不老实，挤牙膏！”我拿定主意，要我瞎编，我编不出来，没那个想象力。再说，别人瞎编，我也瞎编，也对不上茬呀，什么时候是个完？一天天熬着，时间长了，也许他们觉得我这管牙膏挤得差不多了，就不怎么来了。

3.我在怀柔“学习班”的“幸福生活”

“文革”期间从1966届到70届的大学生，统称为“老五届”。1968年宣传队进校前后，1966、1967、1968届陆续分配离校。本来到1970年最后两届都应当离校，但1970年初却来了一个文件，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暂缓分配，留校搞运动，工资按毕业生发放。听说，北京当时还有外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也照此办理，为什么单留着这两所院校的两届学生，不得而知。

我被抓到怀柔，心中放不下的是在南方的老母亲，在这之前每月都要按月给她老人家写信寄钱，忽然失去联系，怕她老人家担心。再一个放心不下的是我的恋人、同班同学苗致平，“4·26”那天晚上她回北京的家了，第二天回校后发现我被抓走了一定很着急。后来解放军说你可以写信，但要经过我们审查。我给苗致平写了一个条子，让她替我每月给母亲寄钱，同时代我给她老人家写信。从此经常收到她通过宣传队和“学习班”转来的信、钱和衣物，每当收到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像过节一样幸福！有时候，我也写一个条子让捎给她，因为既不能说案情，又不能说我的处境和心情，条子写得很短也很少，只能反复说我很好的，让她不要担心。

从留存至今的来往书信看，五六月份她来信内容还比较正常。5月18日、6月14日、6月23日、7月14日她的来信都是告知：“你在那里好好学习，我这儿一切都好，你勿念！”“妈妈的钱已经寄去了，我给二嫂（当时我母亲在上海我二嫂处）写了信，家里很好，勿念！”“你需要什么东西，来信告诉我，你走的时候，线裤扔在那里是脏的，我给你洗了。”

7、8月份我给她写信很少，她急坏了。其中8月26日、8月28日、8月31日连续来了三封信，一个劲地问：“没接到你的来信，你还好吗？”“你箱子里的东西也不知道动没动过，我怕里面的衣物发霉了想拿出来晒一晒。工宣队师傅说我动你的东西必须经过你的允许。”（实际上我的箱子早就被撬了）。“你说要我不要挂念你，这是不可能的！”“国庆节我想给你买块手表，我妈说，钱和工业卷（那时买很多东西须凭工业卷，工业卷数量依据工资数按比例发放）不够先从家里拿。”“盼回信！”“请回信！速回信！”字里行间委婉地传达着她不离不弃的态度和对我的担忧。

天冷了，她给我送来了棉衣。每次送来衣物等，我本能地要里外翻翻，盼着能有什么没通过检查的消息，这一次自然也细细地翻检一通，仍然没有什么发现。直到第二年我从隔离室中放出来后，才知道她真的在那件棉衣的袖子里缝入了一块小布条，布条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道：“切记，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乱承认，不要乱上纲。对中央同志是坚信；是有的事不理解、议论过、怀疑过；是专门调查、还是在调查别的事时涉及到。一定要按当时的情况，严格地划清界限。头脑要清醒，不要摇摆，心里有鬼的才心虚。心要放宽，一定要想的远些。”这些书信和这块小布条，我珍藏至今。

9月底以前对我的看管比较紧，9月底，忽然感到比以前松多了。10月5日，负责我的两位姓张的军人找我谈话：“你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怀疑康生，主要是因为和谭厚兰

〔5〕对立。认为康生是谭厚兰的后台嘛。”那些天，还可以每天由看守的战士跟着到外面散散步、放会儿风。时间长了，和小战士也混熟了，大概他们也看我不像个“反革命”，干部不在时，也和我聊聊天。有一位胖胖的、时常满头大汗的小战士与我关系甚好。有一天他偷偷地告诉我说：“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我听后很吃惊，联想到近来“学习班”的形势急转直下，又高兴起来，以为很快就要放了我们的。没想到，11月7日怀柔“学习班”撤销以后，大多数同学都回了班、系，我却被拉回师大继续单独隔离，直到1972年3月8日分配离校之前才获得自由，共计被关押319天。

二、4·26事件的背景

1.宣传队进校初期的师大基本形势

1968年8月，宣传队进驻师大以后，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是哪一派的群众都基本回了班、系，接受宣传队的领导，参加所谓的“斗、批、改”。我本人从1968年秋到1970年初，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班级活动。

这两年时间，宣传队在师大主抓的大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给我记忆很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有一次，驻我班的工宣队Y师傅对学生说：“物理楼看门的老头我看就是特务！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观察过，他那条瘸腿是装的，有人的时候就瘸，没人的时候就不瘸！”另一件事就是批斗马本堃教授。马教授被人举报把《毛主席论教育文选》改成“天主教文选”，这是“极其恶毒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还专门组织全系师生观看了反革命证据：在一本《毛主席论教育文选》封面上放了一块特殊的光学玻璃片，透过玻璃片可以模模糊糊看到封面上有用红蓝铅笔画的左一道、右一道。据马教授交代，是大人没注意，被不懂事的小孩子画的，他发现后，就用橡皮擦了，可能擦得不够干净，被人举报了，于是三天两头地批斗。有一次批斗时，马教授不肯承认是有意的反革命行为，Y师傅在我身后一声暴喝：“你他妈还讲不讲理！！”吓得我一激灵，只见前排几个同学冲上去，动手打了马教授，马教授蹲在地上抱头哀哀直叫！

1968年秋，因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离校，有很多宿舍楼逐渐空置了，有一些同学不愿意在原来的宿舍挤着，陆陆续续自行跑到空置的楼里去住，也没有人强行干涉，其中中南楼就是这样的情况。到1971年的“4·26事件”发生时，中南楼所住的学生很杂，除了有原来“井冈山造反兵团”〔6〕的人（其中就有原“兵团”的几个头头如方××等），也有所谓的“逍遥派”，还有宣传队依靠的所谓“一支力量”。这些人，大多数白天回班系参加活动，晚上回到中南楼睡觉。例如我班的孙××同学就是这样，他自己一个人在二楼占了一间宿舍，天天晚上焊收音机玩到半夜。

我从未参加过“造反兵团”，对“兵团”的那几个头头，也是我知道他，他不认识我。所以在怀柔头一个多月他们要求平山头、批派性时，我说：“我没有山头，我只是一个对宣传队在‘批清’运动中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群众！”

2.吊诡的“批清”运动

宣传队在师大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简称“批清”。

“5·16”本来是出现在1967年春夏之际的一个小小的组织，号称“5·16兵团”，他们的矛头所向非常明确，就是指向周恩来。当时在北师大、学部和一些其他地方，

一夜之间贴了许多周的大字报、大标语。但很快就被群众镇压下去了，相关的人员，抓的抓、斗的斗、跑的跑。

周恩来在1967年9月18日对外交部讲话中说：“对5·16问题，第一不要把5·16问题扩大化，到处抓5·16，不要把5·16和很多组织都联系起来，与5·16有关的人是很少的，哪有那么多的5·16呀！”

1967年9月1日中央领导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江青说：“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不仅把矛头指向总理，还指向康老、伯达（7）和我”。康生说：“5·16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从上面的几段讲话，不难看出，周恩来认为“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图很明确，即“不仅反周是5·16，反对我们的也都是5·16”。

吊诡的是，自从1968年以后，已经不怎么提“5·16”了，却在1970年左右从上到下又掀起一股“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1970年1月24日林彪（8）、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黄永胜（9）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

3.宣传队把部分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从一开始，师大宣传队就提出“抓5·16和其他反革命”的口号，后来干脆喊：“（师大是）黑手两边插，5·16两边抓！”所以，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蓄意要扩大化，把矛头指向群众，包括指向谭厚兰对立面的群众。

从根源上清查谭厚兰等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极左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能说清楚砸孔庙是对是错吗？敢批判谭厚兰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问题吗？众所周知，谭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在她后面的那条黑线操纵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谭也是被人利用的牺牲品。谭的身后有一条黑线，这在师大尽人皆知，直接操纵她的就是《红旗》杂志编委林杰。康生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众宣布：“还有人讲林杰同志有后台，后台是谁呢？后台是关锋，这里边有一条线索说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是我！你们来审查审查，我们算不算黑帮？算不算黑线？”

1967年8月底关锋、林杰（10）倒台了，谭居然在9月1日召开大会，宣称要与革命左派林杰站在一起，甚至派革委会副主任董××率众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以示声援。正因为有后台，在1967年8月底以前，谭厚兰一直是顺风顺水。今天出一个《在北师大的军训团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经验，登在两报上，明天谢富治（11）又跑到师大开一个“大批判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北京的高校中，谭的对立面是最弱小的，这不是因为她正确，而是她始终受到那条黑线的百般呵护。

所以，在1970年前后开始的“批清”运动中，长期站在谭的对立面的、受那条黑线打压的群众总认为宣传队的“批清”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一厢情愿地期盼在批谭的过程中能彻底揪出她身后的那条黑线，实在是情理之中

的事。当然，这种期盼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也是因为这种幼稚，这些人有时会做出许多不为旁人理解的“蠢事”！

宣传队也许不了解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人不听话，干扰他们执行上面制定的“大方向”。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矛头指向这批人，要在这些人里面“抓坏人、抓反革命”，最后干脆硬要给这些人扣上“5·16”的帽子，因为江、康等中央领导说了嘛：“反对我们也是5·16！”这就不可避免地把这些持不同意见的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4·26”事件。

三、初入“校办监狱”

1.我住进了师大革委会修建的“校办监狱”

1971年11月7日，我被押送回师大，关在11楼二层西头的一间房间里，看守换成了师大学生，都是物理系64级的同学。三个人（有时两个）白天晚上和我住在一间屋里，厕所在楼道里，上厕所由一个人跟着，吃饭他们上饭厅替我打来。从此不让出去，也没有放风时间。开始的一个多星期关在这里，也许是专案交接工作还没做完，这一个多星期很少审问。

这座楼“文革”前是留学生宿舍楼，“文革”开始以后，外国留学生陆续回国，这座楼就空了下来。谭厚兰成立师大革委会以后，把11楼的一部分改造成了“校办监狱”，专门关押他们抓捕、绑架的师生，楼道里用拇指粗的钢筋焊了铁栅栏，栅栏上有一个铁栅栏门，锁上以后人就出不去了。到我住进来时，楼内的人很少，一天到晚楼内静悄悄的，偶尔听到铁栅栏门的咣当声。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座“校办监狱”。有一年革委会突然宣布揪出了一个“尚文廉反党集团”，都是历史系学生，具体的情况不清楚。我在历史系64级有一个好朋友叫李万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瞎扯。有一天中午，他正在饭厅吃饭，忽然冲进来一群打手，将一只人造革的空提包望他头上一套，扭着胳膊就把人抓走了。拉到一辆车上转了半天才到地方，用铁丝捆上他的手脚，扔到一个房间里才拿去头上的提包，李万庆仔细一看，这不是11楼吗！审问他与“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万庆是个老实人，平时说话都磕磕巴巴，哪见过这个阵势？至于和“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交代不出来就打。那时候，谭厚兰手下有一批打手，大部分都是体育系的男生，一个个膀大腰粗，一身蛮力。最出名的是两个：一个外号叫“黑狗熊”，一个外号叫“白狗熊”，这两个家伙打人最狠、最多。这些打手持胳膊粗的木楞、镐把没头没脑对万庆一顿暴打，打得他死去活来，浑身是血。打完了再用烟头烧，烧烂了他一片胸脯！

就这样天天拷打、烟头烧，万庆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对看守说，我身上都烂了，衣服上都是血，让我去水房洗洗衣服吧？看守同意了，万庆进了水房，趁看守没注意，跳到水池上，撞破了纱窗跳楼自杀！万幸的是，他跳下来的楼层不高（好像是二楼或三楼），正好窗下有一丛丁香花树，他掉在这棵丁香树上，只是腰部摔伤了，命保住了。

关了一段时间，实在查不出问题，后来就把他放了。万庆放出来后有一天中午到我们宿舍找我，向我诉说他在“校办监狱”遭的罪，脱下衣服让我看胸前被烟头烧的一片疤痕，那疤痕的面积足有一本书的大小。一个大男人，边说边哭，我又难过、又愤怒！宿舍里其他同学一声不吭，静静地听他一个人哭诉。

这件事使我更坚决地站到了反对谭厚兰的立场上，我绝不认同这个残暴的革委会！

还有一件事对我的刺激也很大。1967年夏季，革委会在大操场召开批斗彭德怀、罗瑞卿（12）大会。我因为好奇，挤到会场最前面紧靠主席台的位置看热闹。只见两个军人扭着彭德怀的胳膊，把他押到会场，彭剃了个大光头，没法揪头发，这两名军人一人一只拧他的耳朵，用力很大，把耳根都撕裂了，鲜血顺着彭老总的脸颊往下流。彭老总疼得大声吼叫：“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

批斗罗瑞卿的时候，是几个军人用一只竹筐把他抬上来的。罗的一条腿打着石膏，据说是跳楼时摔断了，不能站立。有人就找来一只三脚圆凳，又不让他好好坐在凳子上，把凳子翻过来要他坐在凳子腿上。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幻灯机，打出一束蓝光照在他的脸上。

我在台下看到这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钻出人群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2.我的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9·7事件（13）以后，快到年底的时候，中文系张××、物理系张××等人牵头，串联了全校13个系、部，63个井冈山公社内的“战斗队”，商量着要起草一份《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当时联络了十几个人，在主楼的一间屋子里开了若干次会，讨论起草声明内容，张××让我去参与了讨论。最后《声明》起草完了，有人说，咱们最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来发表这个《声明》才好，商量的结果说就叫“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吧。1967年12月，《联合声明》在“兵团”广播站播出，播音员是一个被一些人骂作“喇叭虫”的刘××，这只“喇叭虫”中气十足、字正腔圆，把这篇包含4个大问题、共计1万2千字的声明播得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用今天的眼光看那篇《联合声明》，它并没有脱离“文革”语境的窠臼，但在《声明》的最后喊出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井冈山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友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当时全校许多厌恶派性斗争，主张联合的中间群众中确实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师大“海派”的由来。其实据我所知，所谓63个“战斗队”，有不少也就一两个人。“大海编辑部”后来还写过一个声明，但没有太大的影响。声明发完了也就散伙了，并不是一个群众组织，但“海派”的主张和思想却深入人心，后来凡是持主张联合、反对一派打压一派观点的群众，都把自己看成是“大海”一派的。

也就是在这个“大海编辑部”，我认识了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他们是一个叫“井冈怒骑”战斗队的成员。此后，我时常去这些老师家玩，他们当时正在调查原中文系的党总支负责人、校革委会常委李××，认为李××经历复杂、想查一查她有没有问题。这个调查组主要在黄××老师家活动。1月底，他们说李××是河南人，提供了很多线索，准备派人去河南外调，于是由黄××老师捐了90元钱，物理系62级的学生林××、杨××分别捐了40元和30元钱，于1968年1月26日派我和物理系62级的林××、袁××三个学生去李××的老家河南外调（其中袁××较早退出调查）。

1967年夏，据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有一个叫吴传启的人贴周恩来大字报，遭到群众反击后逃到了河南。我和林××在河南南阳汉剧团有一个调查线索，找一个叫张晓钟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这个张晓钟见人自来熟，特别能侃。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吴传启，他说，吴是他的表弟，前些时还来他这儿住了一些日子。他问吴怎么来了，吴说，我

贴了周总理的大字报，有人要抓我，曹大姐叫我出来躲一躲。他问吴：“曹大姐是谁？”吴答：“是康老的爱人。”

那天好像是他们单位管盖章的人没在，天也晚了，我们就说，明天我们先去别处，你把我们今天找你调查的情况写一下，让单位盖个章，过几天再来拿你写的材料吧。等过几天我们去取回材料后才发现，这家伙把关于吴传启的那一段话也写上了，这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南阳，160元钱三个人在外面跑1个多月经费十分紧张，也不能为这么个材料回去找他重写。

那一个多月，每天只能吃一两毛钱的饭，河南有一种发面的大饼，一顿饭只买一小牙充饥，后来没钱坐车就步行。我是3月10日回到北京的，这时候我的棉鞋底后跟都磨穿了，撕了一块旧毛巾垫着脚后跟回到学校。

这份涉及康生和曹轶欧的材料，拿回学校后谁也没有说什么。宣传队进校以后，1968年11月6日，连同其他的调查材料都交给了宣传队，12月26日黄老师让我给宣传队写一份报销申请，宣传队还把黄老师、林、杨三人垫的调查经费报销了。

就是这样一件事，后来竟成了宣传队整我的“主要罪状”。说实在话，在师大那个环境里，谁听到张晓钟说的那件事，都会有些想法。但我至今后悔的是，回校后对同班的三两个人说了，因为大家观点相同，平时在一起无话不说。我说：“康生如果不支持人炮打周恩来，为什么要给吴传启通风报信？”

事情在1968年4月8日发生了激变，那一天物理系赵亮坚先生和他的夫人突然双双触电自杀。赵先生“文革”前给我们上《普通物理》课，对我们班的学生一直视如兄弟子侄，关系非常好，运动中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所以观点上自然也差不多，接近“大海”的观点。谭厚兰的革委会为了整治这些人，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造舆论说赵先生是美国特务（赵是旧辅仁毕业，与王光美是前后届的校友），准备办他的“学习班”。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自尊心强，不肯承受这样的侮辱，在办“学习班”的头一天自杀了。这件事对我们班震动很大，有一位同学很紧张，认为我们一切都错了，这回让革委会抓到把柄了，于是跑到系革委会主任段××那里揭发了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以示与我们决裂。段××立即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当时的情况下，这可是了不得的“反革命罪”。去河南外调，无限上纲说你是“专门去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也有口难辨。我当时又急又气，一股火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后来我借口养病跑回了南方老家，暂时躲开了这块是非之地。等我从南方回校后，宣传队已经进校。在抓到怀柔之前，从来没有人再对我提起这件事。

3.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

如果有人问我，长时间单独隔离关押，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告诉他：孤独、惶恐、渴望向自己的亲人、朋友倾诉。

从4月26日关到11月中旬，已经半年了，身边没有一个真心善待你的人，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落得个什么下场。真想向亲人倾诉自己的心情和处境，真想知道是否因为我的问题连累了他们。

在11楼里关押的那几天里，我注意观察了一番，发现虽然环境很压抑，但也许是正在交过程，看守并不太严。夜里自己到楼道里去上厕所，看守我的同学睡自己的大觉，没人

起来跟着。有一天半夜我在厕所里待了半个小时，回去没有反应。而且我还发现，走廊里通向外面的铁栅栏门有时会忘了上锁。

11月中旬，我听看守的同学之间交谈，好像要把我转移到西北楼学生宿舍继续隔离，担心到那儿以后人多眼杂，与外界联系更困难了。就在那几天偷偷地给苗致平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叙述了我的思念和担忧，介绍了半年来我的真实情况，贴了一张在怀柔时托小战士为我买的4分邮票，怕寄到师大被人截了，信封上写的是致平家里的地址，收信人写的是她母亲的名字。11月14日后半夜，趁看守都睡熟了，我外面套上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单秋裤，不顾一切地跑到了楼下。不敢在校内邮箱投寄，从南校门跑到了校外，在经过门卫时，幸亏无人盘查。我跑步到小西天附近的一个邮筒投出了这封信，又跑步回到学校，回到11楼监室内，也不知道一共用了多长时间，看守们还在睡觉，没人发现我出去过。

这封信她母亲收到了，老人看后把信交给了她的女儿，不但没有责怪女儿，反而嘱咐女儿要善待我这个“反革命”，要等我出来。几个月后我出来了，去看她老人家，言谈之中我对同时被抓的另一位同学没有实事求是、乱招供的事略有怨言，这位睿智、慈祥的老人轻轻地说了一句：“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逼那孩子的呐！”

四、那一道道苦辣酸甜，怎一个“忘”字了得？

1.打态度

11月16日，我被转移到西北楼三楼的325房间（南面从中间往西数第三间），继续单独隔离，还是两三位看守与我同住一屋。我不知道为什么继续关着我，我怀疑康生的事都说了，再说也是那些东西。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军宣队一位姓杨的排长，杨排长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希望你起来革命，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划清界限，不要上坏人的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叫我揭发张××，据我所知，他也就是和我一起怀疑过康生，别的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事你叫我说什么？

见我一直不开窍，杨排长很生气。有一天上厕所小便，进去时他已经在里面，见我进去了，他尿完了不走，盯着我看。他这一盯着看我，我就紧张，半天尿不出来。这时杨排长愤怒了，从后面推我一下，说：“你尿哇，你怎么不尿了？”我的脸突然磕在墙上，压抑半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转过身和他大吵起来。我说：“你们想干什么？我有多大问题？你们这样对我！！”大概看我的样子太疯狂了，他的态度一下子缓和下来，说，“你先回屋，我们再和你谈！”

第二天专案组十几位全体成员在三楼中间的大房间里开会，对我“打态度”，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全体专案人员。在一张大会议桌旁，我坐在一端，杨排长坐在另一端，其他的人围坐在桌子周围。我看到，这些专案组成员中，只有两位是我同班同学，其他基本都是64级的学生。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言，大意都是要我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说实在的，别人说什么我都没往心里去，他们说什么都伤不着我，但我在意同班同学，毕竟一个班六七年了，总有一些同窗之情。让我感动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垂着眼睑，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她当时的形象让我永远忘不掉，在我倒霉的时候她不肯对我落井下石，我感激她！

2.好汉张道经

搬到学生宿舍关着，虽然只能在上厕所和洗漱时由看守跟着去，但在楼道里还是会遇到熟悉的同学，通常他们看见我都装着没看见。到西北楼的第二天去水房洗碗，刚一进去，就迎面遇到64级的武××，他也是曾被抓到怀柔的人之一，原来我们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一见他，情不自禁“哎”了一声想和他打招呼，只见他急速地轻轻地摇了摇头，把眼睛转向别处，迅速从我身边出了水房。

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11月底的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刚在厕所里蹲下，只见急匆匆进来一条大汉，见到我一愣，回头看了一眼，看守我的同学没进来，迅速地凑近我悄悄地说：“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喜出望外，小声说：“明天还这个时间，我在这里等你！”从此，通过他我与外面有了一条联系的秘密通道，每过几天，他就替我传递一回书信。

他就是张道经，一位典型的山东好汉。说来也是缘分，道经是我入师大认识的第一位同学。1965年8月26日他和我同一天到北京，同一时刻到师大东门的新生接待站，都是物理系的新生。我背着一顶江西草帽，他背着一顶山东草帽，我俩一同从学校东门走到西南楼。他热情万分地对我叽叽呱呱说了一路，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山东话，他那口淄博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就这样，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虽然不同班，却比许多同班同学关系还要密切。这主要是因为道经是一个豪侠仗义、敢于担当的汉子，与他交朋友让人放心。

在“十二月黑风”中，他们班的C××因贴了“反革命大字报”，成了抓捕对象，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连夜买了车票将C××秘密送上火车逃回老家躲过一劫。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分配他负责检查收到的举报信。有一天，道经发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电子专业的×××老师做学生时在57年“反右”期间有所谓的“右派言论”，信中言之凿凿，有时间、地点、在场人名。他当时就愣住了，心想这封信只要进入宣传队的视野，必定会进入“清队”审查程序，那位老师就惨了。想到此，道经悄悄地把那封信藏了起来，晚上到那位被举报的老师家把那封信给他看了，那位老师脸都白了，然后道经当着那位老师的面把信扔到煤炉中烧了。事后道经说，这事过后他也后怕，之所以要给那位老师看看这封信，是怕万一那位举报人再次举报，好让被举报的老师有个思想准备。

我这一生结交了不少朋友，道经是我最难忘的一个，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勇敢地伸出手，帮我度过那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在撰写这篇回忆录时，我问他当时为我传递书信是否害怕过，他说：“没有害怕过，当时只是觉得兄弟有难理应相帮！”

3. 笼中书简

在怀柔时，可以通过“学习班”的解放军和师大宣传队与外面通信、寄钱，外面也可以向里面送信、送东西。回到师大后，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被宣传队切断。有一次，我把在怀柔苗致平给我送衣物的包袱皮请他们还给她，都招来了一通审问：“为什么要把包袱皮给她？那以前是包什么用的？”疑神疑鬼、十分可笑，所以为了不给她找麻烦我也不再通过宣传队和她联系了。她求宣传队给我送过三封信和其他物品，除了一件棉衣全部被宣传队扣留，到最后也没人交代这些信和物品到哪里去了。

致平知道我关在西北楼以后，有时候故意跑到325室的对面串门，对面住着一位她认识的女同学刘××，进来出去大声说话，让我听见，但专案组不让我们见面，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种思念更加强烈。12月18日，我让道经传了一封信给她，信中说：“我身边连

你的照片都没能带上一张，‘4·26’那天晚上我上衣没穿，被抓走了，你的照片在我上衣口袋的夹子里，前些天我向他们要那个夹子，他们没给我，他们是不会给我的。如果你同意，就让他（道经）带一张你的照片给我吧。”

第二天，道经给我带来了一张照片，照片夹在一张字条中。这张照片是我们俩在“4·26”前一周的1971年4月18日照的，地点颐和园后湖，上海牌120相机自拍。那是一个星期天，这里幽静安宁，背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我们俩坐在一颗横在水边的树干上，年轻的脸上笑容粲然有如周围的春光，完全感觉不到灾难的逼近。这张照片成了我们终身的纪念，它见证了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见证了我们不平凡的感情历程！此后，只要有机会去颐和园，我们一定要去当年拍照的地方，照一张和当年的角度相同的合影。

从保留下来的这个阶段的书信看，回师大后12月底以前一直还是逼我交代问题。我在给致平的信中通报了他们安在我头上的罪名，对怀疑康生问题非要我承认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收集黑材料。11月24日我的信中说：“今天下午找我，说我还有重要问题没有交代。我说，哪些问题没交代能否给我举个例子？他们说：‘李××调查组的问题，就没交代清。’还说：‘师大三大调查组，马建民、刘镛如、李××调查组都是调查康老的！那两个是兵团搞的，李××这个是兵团、大海一起搞的。’看样子是不顾一切要把李××调查组打成黑调查组了。”“我自己有错误我自己承担，想叫我陷害大家是不行的。我没有在组内（指李××调查组）议论过谁，我们在组内也没有讨论过或议论过那份材料中涉及的那件事。”“这件事可能会找你的麻烦，但也不要怕，不管如何也不至于把你怎么样，不管怎样我绝不连累你，只要你平平安安我就放心了！”

她在给我的来信中，一如既往地说她在外面很好，叫我放宽心，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时通报了外面的情况。1月19日我给她的信中说：“我现在就等着他们最后拿出事实来，靠假口供总是不行的，总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但是也有可能到毕业的时候仍然不放我，因为我没有顺着他们的意图乱编，因此借口我的问题没搞清不让我毕业，那样的话我就害了你了！想起这些心里万分难过，五年来我没有给你多少温存，倒给你造成许多痛苦和烦恼，到最后还让你为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对不起你！我对你欠下的这笔债永远也偿还不了！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也和我割不断感情，所以我希望你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回师大后，从来没有放风一说，只有一次开全校大会由两名同学跟着，搬张椅子远远地坐在会场后面。长期不见冷空气，又不活动，那一次外出引起了严重的冷空气过敏，手、脸、脖子只要是裸露在外面的地方都起一片片的疙瘩，奇痒不止，这个毛病很多年以后才慢慢痊愈。那一年春节我在囚室中度过，看守我的同学有些也回家了。

春节前，我收到致平节前的最后一封信：“对你学习班的人，由于看管你要影响一些自己的利益（如回家），心里对你有气，你对他们态度要好，平时少找他们的麻烦，现在这样做有好处。春节到了，你特别要把心放宽，目前一切都是暂时的。王××春节回大连结婚，刘××、隗××也要结婚了，祁已结婚，大圣、老高都回家了，大家都很好，我也还好，你放心。”

这些用各种大小不同、颜色不同的纸张写的信，记录了我在囚笼里的真实情况和思想，也记录了她超常的冷静、坚定和柔情。

4.渴望自由

现在回想当年的境遇，在西北楼关着的那几个月里，如果没有她不断通过道经送给我的这些密信，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那几个月，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她不断地叮嘱我“要放宽心”，“要想得远一些”，“要实事求是”，她的嘱咐和柔情，使我顶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坚守住道德良心的底线。在一封信中，她说：“马本堃就是个例子。”马教授不管怎么压、怎么打，就是不承认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有一天，我在桌子底下捡到一张废纸，好像是专案组哪位同学写信时扯下的废纸，上面有几行字，其中有这样几句：“目前工作进展不是很顺利，估计要解决问题还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领导也不急于结案。”看到这个，我心里十分烦躁。1972年1月14日我给致平的一封信中说：“从12月份到现在又接连好几个星期没有找我，也不布置学习内容，成天不理不睬地呆着，每天我自己在宿舍看书。我不抱什么幻想，可能就是要这样一直关下去，短时间内是不会放我出去的。道经下月要回家，你要有什么事在他回家之前告诉我，他回家期间我就不能和你联系了。我回来后就收到你送来的棉衣，别的什么也没收到。望你也多加小心。我一定会实事求是，现在我根本就没没什么可谈的了！”2月4日我给她的信中说：“我心里有些难受，这一阵主要是春节到了的缘故。到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还会难受一阵的，到六月份要不放我还会难受。我真渴望自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求他们或胡说一气，都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去干那些没有用的事。”

就这样咬牙坚持，整个一、二月份就这样相持着。那一年的春节是2月15日，春节过后不到一个月，1972年3月8日，终于宣布对我结束隔离审查，我部分恢复了自由，回班级“接受群众监督”。

五、“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

1.劫后重逢

1972年3月8日，我结束了319天被囚禁的生活。出了囚室我才知道致平早就病了，诊断为肝炎，在校医院住院。我到服务楼商店买了一斤白糖赶紧去了医院。

她住在医院二楼的一间病房里，脸色苍白，躺在那里。近一年没见面了，见面了我却不知说什么好。她见我的第一句话却说：“你受苦了！”我们相拥而泣，诉说分别后对彼此的牵挂和思念。我感谢她近一年来按月给我母亲寄钱、写信，免去了她老人家对我的担心。同病房的病友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下午说到入夜，忘了吃饭，忘了天黑。

从她的诉说中，我才了解到11个月来她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我们刚抓进去时，她和一些同学到处奔走投诉，企图营救被捕的同学，无人理睬。回到学校，宣传队还要他们交代投诉、营救的问题，说：“你们不是会告吗？你们送给周总理的材料现在都在我们这里！”宣传队要她揭发我的问题，那个李××专案组的一些活动她当时也参与了一些，宣传队老怀疑我有什么材料藏在她那儿了，逼她交出材料。我确实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藏在她那儿，当初她知道我有怀疑康生的想法都害怕，不许我在她面前议论这些事情，所以她确实没什么可揭发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交出来的。

元旦之前，她给我写了信，买了几张贺年卡。那时的贺年卡就像后来的信用卡、银行卡那样大小的一张塑料卡片，一面印着样板戏的剧照，一面印着年历。她求宣传队把信和这几张贺年卡转交给我，宣传队一看，那几张贺年卡的剧照印的是《智取威虎山》，顿时火冒三丈，把她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你什么意思？你是想骂我们是座山雕，他是深入虎穴的杨子荣吗！”把信和贺年卡全部扣下了。

她是一个心里有事不露在脸上的人，禁不住这样时时施压，天天敲打，元旦过后不久，她就病倒了，吃不下饭、恶心、呕吐，到医院检查转氨酶比正常值高出几倍。那时候医疗水平也不高，就按肝炎治，也就是给点维生素、吃些中药。到我放出来时，虽有好转，但仍不正常。

每天去校医院看望致平，都要穿过“绿园”〔14〕（现在好像已没有了）。有一天，在“绿园”迎面遇到当初李××调查组的一位中文系老师，见到他我高兴地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冷冷的说：“你在里面交代了不少问题吧！”我的心情顿时恶劣到了极点：当初是你要调查李××，我一个跑腿的调查时吃尽了千般苦，出了事我在里面扛着，如今你还说这样的话！作为比我们年长许多的人，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难道你想不到，如果我真“交代”了什么对你不利的东西，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2. 烈女刘月英

我到医院探望致平的时候，在楼道里经常看到有一位下肢瘫痪的女生，拄着双拐在别人的搀扶下练习走路。那女孩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累得满头大汗，小脸憋得通红。我问致平：“那是谁呀？”她说：“外语系的，叫刘月英，兵团丁×的女朋友。丁×被抓到怀柔去以后，宣传队说，抄家时在丁×的褥子下面搜出了避孕套什么的，当众羞辱她。她受不了，就跳楼自杀，没死成，腰断了，下肢瘫痪，不知道还能不能走路了。”

后来我听说，刘月英是一个山东农村的女孩，家里很穷。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师大外语系，和我们同届。这个要强的山东姑娘，入学第一个学期所有学科全部满分，在一年时间里入了党，当了学生干部，她是一个要脸的人。“4·26”她的对象丁×被抓走后，军宣队一位参谋在外语系全系批判大会上当众羞辱她，说搜出了什么什么，说：“他们可是还没结婚哪！”那以后的几天里，刘月英一直不说话。几天以后，又要开全系批判大会了，眼看着一场加倍的羞辱不可避免。当同学们都去会场以后，这位刚烈的姑娘从女生宿舍中北楼西侧的四楼阳台跳了下去，用死来抗争这一切！一位去水房打水的生物系女生正好经过楼下，看见她摔到地下，没死，用手死死地掐自己的脖子。被送到医院救治后，她绝食，她是真不想活了！在老师、同学们的日夜劝解安慰下，她总算活了下来。毕业分配时她希望师大能给她口饭吃，哪怕在资料室打打字，师大不留她。令人鄙视的是，她的恋人丁×从怀柔回来以后也与她中断了恋爱关系！她被抬回了农村老家，贫困的家无力为她治病疗伤，又把她抬回了师大，就这样一次次抬来抬去，最后她死在了师大外语系党总支办公室（一说师大招待所地下室）。

今天的孩子可能不会理解当年的事，为这么一点事还至于跳楼自杀？就像全世界的人们不理解，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为什么会判处通奸的男女当众用乱石砸死。在那时的中国，一点点生活绯闻就常常置人于死地！宣传队那位恶毒的参谋，不知道在你的这一生中，当你拥妻携子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可曾想到过有一位娇弱的女孩死在了你的恶意攻击下？你心中是否有过一丝丝的歉疚？

3. 毕业鉴定

我放到班级以后，进班的第一天，由一位姓宋的教师带领班级领导小组严肃地向我宣布纪律：“你现在结束了隔离审查，但仍在群众监督之下，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不许串联，不许自行外出，出去必须报告，经过允许才可外出！”

我出来不久就宣布要进行毕业分配了，很快就进入了毕业鉴定阶段。在作毕业鉴定前，物理系宣传队负责人白本章师傅向我宣布：鉴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属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问题”，上级决定要在我的毕业鉴定中“记上一笔”。所谓的“小组鉴定”实际上是宣传队早就拟定好了的，他们拿出一份鉴定草稿给我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蔡鸣乔同志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调的机会收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黑材料，并在小范围内散布过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言论，经领导和群众帮助，该同志态度较好，建议不予处分。”白师傅说：“你在自我鉴定中也必须写上这些内容，如果不写，对你没有好处！”我说：“我自己做的事，我可以承认，但要实事求是，要准确。有几点我要说明：一、我怀疑康生是5·16后台，是谭厚兰后台，这是事实，我什么时候也不翻案。我希望明确写上怀疑康生，不要含糊其辞地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以免以后搞不清楚，引起误会。二、我上河南外调并非去收集什么黑材料。在河南外调是有一个外调对象在材料中涉及曹轶欧的一件事，是偶然的，并非有目的地去调查。但回来后我曾将此事向几个同学讲过，这确有其事。三、我认为5·16是一个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集团，我的问题和‘批清’运动无关，我犯错误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可以说是‘受错误思潮’影响。”

对我提出的几点意见，白师傅的答复是：“可以考虑你的意见，至于极‘左’思潮还是‘错误思潮’的提法，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一样的。”

后来在我的小组鉴定（也就是宣传队鉴定）中，把其中的“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调的机会收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黑材料”一句删掉了，把“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改成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同志”，但仍然坚持“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我在自我鉴定和个人对小组鉴定的意见中又重申了我是“受错误思潮的影响”，以表示我对鉴定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提法的不认同。

当时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为我向宣传队求情，说：“他这么年轻，给他档案中写上这些，对他一辈子都会有影响啊。”宣传队说：“就是要给他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

4.真感激你与我艰难同行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那时候在档案中装进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一生、对他的家庭子孙后代会有多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就像脸上刺上了金印，走到哪里都不会被信任和重用，遇到政治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折腾。那几天我很郁闷，有一天在宿舍里躺着，另一张床上躺着我的一位同学蒋锡久，其他人都不知上哪了。一开始我俩都不说话，忽然，他开口了：

“蔡鸣乔，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见我没有反应，他自顾自地讲了起来，听我还没有反应，他又说：“我给你唱一段‘空城计’吧，‘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的老蒋兄弟，我知道你我心里难受，千方百计地要哄我开心呢！

我们这位蒋兄在运动中是一个典型的从不理解到有抵触、不掺和的智者。他有很多雅好，是一位有名的围棋高手，爱摄影、会唱戏，结交了大量的同此雅兴的教授、同学、社会上的朋友。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被出卖、被伤害、被歧视的时候，善良的老蒋给我的温情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因为背上了这样的政治包袱，怕连累我深爱的人。我对致平说：“你跟着我，将来恐怕要吃苦了，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两家的老人，都怪我的愚蠢，连累了你们！”她不许我说这些。那些天，我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我们在大操场南、北饭厅北面路侧的双杠旁聊天，我又为档案里“记一笔”烦恼，她却说出了一句让我万分震惊的话：“我们还要活很长

的时间，二十年以后，谁还记得康生是谁呀！”多少年以后，我对她说：“当年你还挺有政治远见的嘛！”她却微笑地回一句：“我那时就是为了安慰你！”

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我一起分配到东北边陲。因为她的病到分配的时候还没痊愈，她母亲特地到师大找了一回宣传队，要求让女儿暂缓到分配地报到，留在北京把病治好。宣传队不同意，说，“五一”以前必须离校，否则取消毕业生资格！

那一年的4月28日，我们在宣传队一名军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北边城。到单位报到才一个月，致平的病就复发了，剧烈地呕吐，转氨酶急剧升高，在医院又住了两个月的院。

1971年12月，致平曾站在雪地里照了一张相，这是一张侧面半身像，照片中的她面带微笑，眉眼间却露出一丝隐隐的忧伤。我给这张老照片取名为《冬日笑靥》，题辞曰：

“笑靥如花，掩不住眉间愁煞。心非铁石，怎禁得日日敲打？那人儿在里面，能不牵挂？也不知收到未，寒衣鞋袜？冷风刺骨盼春暖，不信严冬永无涯！心神遭折病缠身，未曾痊愈又出发。闯关东，再告别爹妈！”

六、尾声

我被分配到一所刚从民办改为公办的中学，一年后的1973年，一年试用期满应当转正。那年3月，学校管人事的曲大姐好心地向我透露：“你档案里有东西，对你的转正班子开会有人不同意。你写封信去北师大，要求他们把你档案里的东西撤了吧！”

我立即给师大宣传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为我的前途着想，能不能修改档案中的记载？3月16日他们回信说：“你给陈师傅的信，谈到对犯错误结论修改问题，原对你记一笔的结论是争取了群众意见，专案的同志反复研究，后组织又多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本着批判从严组织结论从宽定的，同时也经上级机关审批的。对你的结论是慎重的，即不能修改。请你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如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你所在的单位组织反映，由组织与组织联系为宜。”落款是“物理系”，信封的落款是“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师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

1975年，我接大学时辅导员郝老师的一封信。郝老师告诉我，前些时，师大曾给你们单位去了一封公函，落实批清政策，要把档案里的一些东西撤了。我立即去找了单位领导，单位领导说：“是收到这样一封公函，但你的问题在你的毕业生登记表里记着，也不能把毕业生登记表销毁了呀，我们没法处理。”并且让我抄了这份公函的内容，里面说“1972年4月份涉及你处原我校学生蔡鸣乔，在批清运动中有所牵连，经复查，属犯一般政治错误，根据北京市委关于落实批清政策，对犯一般政治错误以下人员不作文字记载，材料不入本人档案的规定，本人或组织在其自传……毕业生鉴定、毕业生政审已入档案的材料中，凡涉及批清运动内容的一律撤销……”落款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小组”。

我看了这份留尾巴的材料，说：“那就不动吧，把材料撤了，留一个‘犯了一般政治错误’的尾巴，有什么用？”

1978年冬，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我的问题还没解决。12月，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师大“运动办”找到一位叫石长庚的同志长谈了一次，他让我回去后立即写

一份申诉材料寄给他。我回来后立即写了这份材料，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及我的遭遇，寄给了师大“运动办”。

我背负着这个政治包袱，为了我深爱的妻儿，我必须证明我不是“反党的反革命”。为了能得到“信任”和“认同”，我用拼命工作来“赎罪”，带别人不愿带的最乱的班，教最多的课，干别人不愿干的工作，有病、有事从来不敢请假，我“老实极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使我的免疫力极为低下。1978年底，从北京回来不久，一场重感冒居然让我患上了无法治愈的免疫功能疾病“肾小球肾炎”，并最终恶化为尿毒症，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做了肾移植才保住了这条命。

1978年12月30日我住进了医院，这一天距师大党委为我作出最后的平反决定只差3天！我在医院病床上收到师大党委寄给我的平反通知，信中说：“蔡鸣乔同志：学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决定平反，恢复名誉。复查结论已寄你校党支部，通过组织向你本人宣读。关于你的档案，我们要求你所在支部加以清理。此致敬礼。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1979·2·10。”

学校党支部书记在病床边向我宣读了这封迟到的平反结论：

蔡鸣乔，男，物理系70届毕业生。

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怀疑康生等问题，受到审查，并于一九七二年作了“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一九七四年撤销了这个结论。

经复查，蔡鸣乔同志主要是怀疑康生、反对“四人帮”的黑干将谭厚兰，是正确的。据此，对其审查是错误的。现决定撤销原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销毁与此有关材料。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总支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同意物理系总支关于蔡鸣乔同志的复查结论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1971年冬，我在囚室里关着的时候，致平和她的好朋友王××照了一张雪中漫步的合影，这张老照片我给它取名为《冰霜路》，曾在上面题辞：

“彤云密布，前程似雾，初践冰霜路。谈笑不言愁与苦，年少难将天心悟。问痴女，顶风冒雪，心儿欲往何处？”

在结束这段回忆时，让我步前韵续一阙上面的无牌小令：

“残生向暮，韶华难驻，惟有情如故。拿捏旧伤夜难眠，善恶忠奸谁无数？告苍生，少些褒贬，留与后人评述。”

注释（略）

2016年1月10日初稿

2016年1月26日第七次修改

（作者简介：蔡鸣乔，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1972年离校分配到丹东，先后在中学、教育学院、丹东师专（现辽东学院）等院校从事物理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已退休。）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  
【劫后反思】

我所目睹的最早的文革暴力  
——北大“六一八”事件追忆和反思

• 扬子浪 •

群众暴力、法外暴力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前三年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文革当局推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非如此，他们就不能动摇和推倒当时的党政体制。在他们利用和推动这种群众暴力时，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和事后的处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也可以说是文革暴力的发轫点。笔者在一九六六年北大“六一八”事件时，是北大数学力学系四年级学生，当天在校园内目睹了这种野蛮暴力的实施。五十余年后，我仅以这篇短文记下对这次最早的文革暴力事件的追忆和思考。

1966年6月18日上午，我从所住的北大学生宿舍29楼出发，穿过著名的三角地，沿着当年的二食堂东面的空地朝大饭厅（现在的百年讲堂）方向走去，准备去东门内侧的一个阅览室，当时称第四阅览室看书。突然看到三个人沿着南校门入口处的通衢大道，向大饭厅方向奔来，中间一个人，头上戴着由厕纸篓做成的高帽，脸上和身上的白衬衣沾有大片墨汁。左右两个人手执细木棍，像赶牛赶马似的，并对其抽打。我当时十分吃惊，但当他们奔近时我就更加震惊了。中间那位十分狼狈的居然是当时的北大团委书记刘昆（注1）。

刘昆是当时北大最有希望的政治新星之一，他是留苏生或留苏预备生。作为校团委书记，他经常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讲话，在北大学子中有很高的威信。文革爆发前，我们数力学系四年级力学专业的同学在四川内江地区资阳县参加为期大约八个月的“四清”运动，他是我们北大师生的总领队，是县社教工作队的副队长。1966年春节，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撤回资阳县城，好让农民过年。来自内江地区的当地工作队员也纷纷回家过年，就留下我们北大百余名师生在县城，休息，整顿，过年。我们除了学习，总结经验，还聚餐，开联欢会。清晰地记得，在一个晚上，在大家的起哄要求下，刘昆唱了好几首歌。具体是什么歌，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肯定是苏联歌曲，应该是“喀秋莎”，“红梅花开”这一类的。他的音色纯美，演唱感情充沛，在节日的夜晚把我们从穷乡僻壤，带到了远方的“乌托邦”，让大家十分感动。

笔者当时实在很难把两个形象的刘昆联系在一起。等我回过神来，那两个人已经赶着刘昆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揣着一颗不安的心，我绕过大饭厅继续向第四阅览室走去。路过位于大饭厅北侧的哲学楼时，只见哲学楼大门前聚集了几十个人，这些人都处在骚动状态。我距离他们大约有十几米。当时没有靠近去观察，他们实际在做什么也并不清楚。但非常清晰地记得，有一个东欧国家的留学生跨着摩托车停在那儿观看。然后再看见，他脸色大变似乎极度受惊，踩下油门就飞速离去。这个留学生可能是罗马尼亚的留学生。当时北大校园内少量的国际学生主要来自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随着校园局势的进一步动荡，他们也很快地撤离了北大校园。刘昆戴高帽被两个人追打和罗马尼亚留学生骑摩托车惊慌逃离批斗会现场，像定格的照片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五十余年来未曾消退。

我事后按原计划去第四阅览室读书，读的应该是马恩列斯文集之类的东西。但大约在我读书的时候，北大校园内的多处继续发生背着工作组，乱斗乱揪干部和教师的事情。部分学

生还在38楼前设立了“斗鬼台”，批斗了几十个他们能找到的中下级干部、教师。这些所谓的批斗，就是对受害者施行人格侮辱的暴力：诸如戴高帽、游街、泼墨汁、坐喷气式等。这就是文革史上著名的北大“六一八”事件。

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乱揪乱斗现象发生时，正值北京新市委派驻北大的工作组在召开全校大会。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势力利用空隙，有计划地企图争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工作组马上分赴各处制止乱揪乱斗。当晚十时工作组召开了全校广播大会，工作组组长、原河北省副书记张承先作了声色俱厉的讲话。笔者当时和全班同学一起在大饭厅听了他的讲话。据笔者的回忆，现场气氛十分紧张。笔者也清晰地记得，他讲到不能引用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的那段著名讲话、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作为乱揪乱斗的理论根据。笔者当时的直觉是虽然大部份同学都在这种迅猛的高压下觉得不舒服，但也反对戴高帽，反对污辱人，反对野蛮暴力。对工作组能迅速控制局面还是支持的。

张承先工作组事后迅速就“六一八”事件向中央发了一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和《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注2）。《九号简报》经刘少奇批转全国，成为派驻各单位工作组的指导性文件。同年七月中，毛泽东从南方返回北京，不满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按照中共的传统，向各单位特别是向高校派遣工作组的做法，要拨正文化大革命的航向。经刘少奇批发的《九号简报》就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材料。秉承毛泽东的旨意，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新贵四进北大，或开座谈会或开群众大会，在全国率先驱赶工作组。在7月26日晚上的北大东操场大会上，陈伯达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组织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6·18’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注3）。他借群众之口宣布这个部分北大激进学生对已经靠边站的北大中下层教师干部乱揪乱斗的暴力事件即“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撤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文件。从此以后文革暴力越发不受约束，不断受到纵容和鼓动，越演越暴。最后在全国多地发展成对普通民众，尤其是“黑五类”及其子弟的大规模的虐杀、屠杀和两派群众之间常规战争级别的武斗。

“六一八”事件发生已经五十多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不能理解，诸如戴高帽、游街、泼墨汁、坐喷气式这种侮辱个人人格的野蛮暴力会首先发生在全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并由资质优良的北大学子实施。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只要稍加梳理，就能发现：先有文革当局以煽动幼稚青年为目的极端野蛮的语言暴力，才有受蒙蔽青年对受害者身体实施的物理暴力。

我们来看看当时引领全国舆论的权威报刊上都讲了些什么吧：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党内不同的政策路线称为“黑线”，号召全党全国向其“开火”。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走资派”、“学术权威”一律诬称为“牛鬼蛇神”，要予以“横扫”。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毛泽东在批示中称北大为“反动堡垒”，要予以“打破”。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宣称,“为陆平、彭珏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请读者诸君注意:“大阴谋”、“黑帮”、“据点”和“堡垒”,这些都是充满黑社会斗争和战争暴力色彩的词语。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时任北京新市委书记的李雪峰后来在他的文革回忆中(注3)认为:“这篇社论无疑给北大的学生点了一把火,因为学生们认为陆平的问题比匡亚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点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斗争过。由于陆平等领导被工作组隔离,他们找不到,于是他们就斗那些能找到的人。”

除了这些头版头条用黑体大字登在中央权威报刊上的战斗号角,还有当时青年学生经常反复诵读的摘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毛泽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津津乐道的湖南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暴力行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杀猪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都成了一些激进青年学生效法的榜样。

张承先在6·18晚上讲话说,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现在看来仍然是定性错误。但他告诫学生不要乱用毛泽东语录则是从本能出发朦胧地感觉到了“六一八”野蛮暴力的精神源头。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确没有必要像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那样尽情地歌颂暴力,他也多次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实际政策的执行中,如对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处理,表明:他需要这种暴力,他在纵容这种暴力,并巧妙地利用这种暴力。他深知这是让“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权威”威风扫地的不二法门,是在群众中造成恐惧,并以此“发动”群众的霹雳手段,是“乱”了敌人,是他在“乱”中取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疯狂的政治实验强加给全国人民的捷径。

注释:

- (1) 刘昆(1934—1996),吉林人,文化大革命前曾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
- (2) 古樟:文革初期的北大——浅析张承先的《“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电子杂志《记忆》第147期,2016年1月15日。
- (3) 李雪峰:《回忆文革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收入《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

【史实辨析】

关于江青的两件事

• 李海文 •

一、

阎长贵比我年长几岁，是我尊重的学长，我们认识七八年，多次交谈，坦诚相见。他借给我维特克的《红都女皇——江青同志》（范思翻译，2005年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一书，我们在一起讨论。但是我看了他的专著《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中的一文《质疑江青与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第311—321页，红旗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第）后，对他的文章中的“质疑”产生质疑，不得不写此文与阎长贵学长商榷。

阎长贵学长在文章的第一部份引用了全程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张颖的文章之后说：“就是在张颖书中所谈的江青所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情况。应该指出，张颖等这种说法传播和流布很广，几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都信以为真，传来传去，简直成为不刊之论了。”（见312页）随后他在文章第二部份引用了维特克的一书的若干段话后，做出结论：“不难看出，维特克和张颖等的说法截然不同，究竟谁说的符合实际？无疑，这是需要辨证清楚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第315页）非常奇怪的是阎长贵又说：“江青似乎确实没有向维特克说她‘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第314页）“似乎”与“确实”是两个相反意义的词，在描述一个事物时，不可两个同用。

正如阎长贵学长所说“这是需要辨证清楚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所以我也要谈谈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阎长贵引用了张颖的文章之后，引用了一个名叫苦多所著的《江青评传》。他认为苦多是抄张颖的文章，“并加上他自己的演绎和编造”（第313页）。苦多不是当事人，阎长贵做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很奇怪阎长贵却没有引用当时在场的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回忆。阎长贵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后被捕入狱，由杨银禄接任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只担任江青秘书一年的时间，而杨银禄任职五年。所以他参加了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

当代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杨银禄的《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在第188—189页写道：江青说：“那时毛主席在指挥西北战场，我也在那里，在毛主席身边，协助毛主席指挥。”江青还说：“我时时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被消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杨银禄的回忆与张颖回忆是一致的。张颖在书中写道：江青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江青：‘……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指维特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一书，第312页）

一般来讲，研究历史不采用孤证。可以采用俩个人的回忆，以互相映证。但是阎长贵对当事人张颖、杨银禄的回忆提出了质疑。他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了维特克在1977年由星克尔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一书中的话，然后说：“这就是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所记载的江青在会见维特克时所谈西北战场的情况。”我从阎长贵处借到《江青同志》一书看后发现阎长贵的引用并不全面，他只引用了有利于他观点的，而没有引用不利于他观点的话。因为这本书看到的人很少。所以我必须也要引用维特克的文章以让读者看到书的全貌。

因为周恩来、毛泽东的反对，维特克没有得到中方的记录。维特克懂中文，当时也做了笔记。她写的《江青同志》是根据自己的笔记写的。到底江青讲没有讲过她与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呢？

维特克在书中这样写道：“她（江青）参考了中央委员会逐日的从延安到北京征途中的大事记，并装在文件夹里，整天带在身边。作为补充资料的还有手绘的地图和详列战役，军队数量和各战场概况的表格。……她对此反复考虑多年，但还没有机会找到一个持续不断地发表看法的机会。外国人必须明白，只有我们（领导同志）才清楚这段历史，只有我们才能全面地描述在全国发生的一切。”（见194页）“房间里有两张大桌子，上面放着6张地图”。（195页）这些地图不仅有西北战场的，还有全国战局的。“江青说到第三次革命战争期间，我注意到她不再使用个人的‘我’，转而使用集体的‘我们’。……对江青来说集体的‘我们’主要限于对解放战争的叙述。”（198页）“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所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第207页）。

我们再看阎长贵引用维特克的话。“她（指江青）和主席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我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北京会见时，江青明确宣布，似乎要消除一种相反的假定。”“江青说：‘在陕北战斗中，我一直在部队中做政治工作，但有人说我是做军鞋……’。她说将集中叙述亲眼目睹的西北战场。”“他们（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一开会，江青不得不离开窑洞，待到一个驴棚里。”（第206页）江青的话前后矛盾。阎长贵只注意、并强调这句话，因而推论江青不可能讲她和毛主席指挥了西北战场。

但是，在这几段话的前后还有几句话他却没有引用。如：

“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所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第207页）

“我说这些，不只是写书的需要，你的到来以及出现在我面前已经激发我把这段军事史告诉全世界。”维特克记录的这段话将江青回忆西北战场的目的昭然若揭。一个基层的协理员怎么有资格全面介绍西北战场？！

“她无意中听到一些同志说主席留在这个被围攻的根据地太危险了。她向主席传达了他们的焦虑，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走。’”

通过以上三个人的描写，江青确实向维特克讲了“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即便在维特克的笔下，江青没有敢用“我与毛主席”，但是她用的是“我们”。这就将自己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列为中央领导人，所以江青的讲话才引起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张颖极大的反感。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认为江青谈话内容不实，如“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争”。江青说：“这个战场的情况除了毛主席、只有周总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全面地向你介绍。”“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45页、第217页、第23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江青和维特克在广州的谈话，由参加接待的张颖等同志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到北京后，由江青定稿，一本一本印成铅字。整理工作还在进行，江青迫不及待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看。她心中有鬼，不敢给毛泽东主席看，是想得到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张、姚不敢得罪她，划了圈，没有表态。周恩来认真地看了，在与事实不符之处做了些补充，做了批示。并且亲自听取张颖的汇报，了解当时谈话的情况和内容。然后，周恩来才做出记录稿不能给维特克的决定，并打电话劝阻江青。1972年岁末，周总理召集参加接待

的同志开会，宣布：已经请示毛泽东，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19页）

如果周恩来认为江青讲的都符合事实，是不会阻拦将记录给维特克的。周恩来是阻止江青不成才向毛泽东报告的。周恩来这样做冒了很大风险的。江青生性阴险，心地狠毒、谄以貌恭、惯于进谗、不择手段地拨弄是非、挑拨离间、混淆黑白。当时，江青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议上，一方面，江青为了表示与众不同，开会时坐在周恩来旁边。另一方面，她时常为难周恩来。有时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议题，江青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要求讨论。江青以毛泽东代表自居，代表毛主席的话时常挂在嘴边。大家都知道，至到1974年夏，毛泽东才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江青“她只代表她，她不代表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94页）另外，周恩来知道江青报复心是十分强的。果然不出所料，一年后，在“帮助”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的调门最高，上纲上线最高。但是周恩来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见自己阻止不成，就向毛泽东报告。因为，只有毛泽东能管得住江青。毛泽东是一个不受别人摆布的人，要是江青没有讲出格的话，他绝不会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毛泽东是解放战争的指挥者，是转战陕北的亲历者，他俩的决定证实了张颖、杨银禄的回忆是正确的。可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十年，却会有人出来翻这个案。

二、

在《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书中，阎长贵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根本”两字，绝对了。因为在党内对此一直是两种说法。师哲对笔者讲过有约法三章。当时共产国际派师哲回延安参加七大后回莫斯科汇报。师哲这样讲的：

1940年我（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就听到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因为回国之初决定我还要回共产国际汇报，康生、江青有意识地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以澄清事实，希望我到国际给他们讲讲好话。

中央党校的党员知道江青经常到主席那，集体写信给党中央，坚决反对主席和江青结婚。中央党校的党员集体写了两次信，要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主席。我记得王世英参加签名。从白区来的同志知道江青的底细，她的几次婚变登在报纸上。大家坚决反对她和主席结婚。后来，文革中，王世英受到迫害与此有关。当时上海市委也来过信反对。张闻天在西方生活过，不愿管私人事情。党校学员派代表见张闻天，说：这不是私人的事情。在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一定要他转达。张闻天不得已将口气和缓的一封信转给主席。主席很生气，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

事情闹僵了，朱总司令出来园场。他找了一个办法，说：不要反对结婚，但是我们可以约法三章。第一，不准江青干政；第二，不准江青搞党的工作；第三，不准江青在公开场合和主席平起平坐。主席接受了。对于“约法三章”，江青也不否认，也同我谈过。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中央党校的干部才平息下来。这样由主席摆了几桌，宴请大家，连张鼎丞都请去了，但是主席不请张闻天。对张闻天转信有看法。（李海文《师哲谈他所了解的江青》《湘潮》2014年第7期）

毛泽东、江青是遵守了约法三章的。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离开了中央党校特别班，并没有进入党的机关工作，而是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这个单位只有两个工作人员，除江青还有杨松的夫人杜晴。笔者1978年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与杜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听杜晴多次谈到江青的情况。这个单位事情不多，江青主要照顾毛泽东与孩子的生活。那时，江青

全心全意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整风时，毛泽东将江青送到中央党校，交给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彭真。彭真安排她在普通班内学习，审查她的党籍。江青老老实实，不敢胡来。七大后被审查的干部都做了结论，她也做了结论，恢复了组织生活。

在延安，江青一直不敢以毛泽东的夫人自居。在延安，邓颖超和周恩来、康克清和朱德、刘英和张闻天、蔡畅与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夫妇都是成双成对地一起看戏，出现在大厅广众之中。而只有江青不敢、不能做到这点。她看戏只能坐在后面，形单影只。这是江青仇恨老一辈革命者，文革中残酷地迫害他们，象疯狗一样地到处咬人的原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江青两次到重庆去。第二次去重庆，不知道她买了些什么东西，竟花了几百万法币，要在中央特会科报销。特会科科长赖祖烈来找师哲审批这笔款项。师哲坚持不批，说：款项不小，等问题搞清楚了再说吧。

师哲回忆：

江青知道后，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表示由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我不要她的钱，而要她讲清楚到底买了些什么，为什么要从党的特别经费中报销。我问她：“特别经费是作什么用的，你知道吗？”江青没有回话。当时，毛主席就坐在隔壁窑洞里。江青大吵大闹。我火气更高，也大声地同她吵。这时，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我明白了，一气之下将桌子掀翻，拂袖而去，堆在桌子上的边币撒了一地。因为弼时支持我，她也奈何我不得。毛岸英过来收拾了屋子。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117页）

中央转战陕北时，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留在陕北。周恩来的夫人邓大姐、任弼时的夫人陈琼英，都到了河东后委，只有江青这位夫人留在陕北。她的职务是协理员，也做不了什么工作，还给机关添了不少麻烦。（第170页）

撤离延安的3月18日早晨，江青因害怕，想及尽早离开延安，和毛泽东发生争吵，甚至摔杯子。当时，卫士在门外听到屋内的争吵，赶快叫醒了还在睡觉的周恩来。江青看见周恩来进来了，才悻悻离开。（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周恩来卫士王还寿的回忆》，见李海文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记》上编，第280—281页）

江青在陕北主要是照顾毛泽东。转战陕北后，她自认为有了政治资本。1948年5月毛泽东到西柏坡后，她在路上截参谋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看。其实她也不敢多看，怕耽误的时间，被毛泽东发现后挨批。但是，就是要摆出她有这样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青在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后来才到中宣部任文艺处长。当时中央机关机构精干，处长就是局长。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她定为九级。当时局长一般是八、九、十级。她做为1933年第一次入党的，1937年10月重新入党的人来说并不过分。那时，她生病很少工作，用她的话是“偶而露峥嵘”。一直到1963年她插手京剧改革才开始在大厅广众之中露面，开始干政。“文革”期间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林彪为了感谢江青的帮助与支持，特地江青的级别由九级提为五级。仍然比邓颖超大革命时期的大姐们低一级。九大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文革十年，她无法无天，罪恶滔天。多行不义必自毙，1981年被判刑。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地想起一个笑话。1980年在特别法庭上，江青对着台上审判她的人大叫：“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阎长贵：《江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漫议从蓝苹到“文革”中的

江青》，《领导者》2013年第3期。）文革中不少干部挨斗，他们常常生气地对台下斗争的人说：“我们革命时，你们在哪？！”台下的红卫兵、群众无言以答。此时，江青套用此话，因为这是她最自豪的一段历史，终于补上象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刘英等大姐、中央领导人夫人长征的一课。但是，她没有想到，她的话竟然引起全场哄堂大笑。为什么？因为坐在台上和台下旁听的人不是十几岁的红卫兵娃娃，而是将军、部长和参加过战争或地下工作的同志。毛主席在陕北指挥作战时，大家在哪？！都在前线指挥、组织打仗、支前，在敌人的心脏里拚命。战争是打赢的，是靠全国战场的军民流血牺牲奋斗取得的；不是当个协理员，爬山时还要两个警卫员架着，跟着毛主席走走，就能胜利的。大家笑，笑江青太无知；大家笑，笑江青太狂妄。这笑声是对江青的蔑视。江青的自作聪明，得到的是自取其辱、自讨无趣。

阎长贵在书中说：“……再加上戚本禹的极力推荐，汪东兴的档案审查，江青终于选我做了她的秘书——揭开了我生平的‘新’的一页，给我平凡、平淡的人生增添一些不同寻常的色彩。”（第283页）他这种质朴的感情我们可以理解。江青参加转战陕北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功是功，过是过，罪是罪。研究历史不能仅从感情出发，要以事实这根据，一是，二是二，否则是站不住脚的。

□ 原载《世纪》2017年第一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